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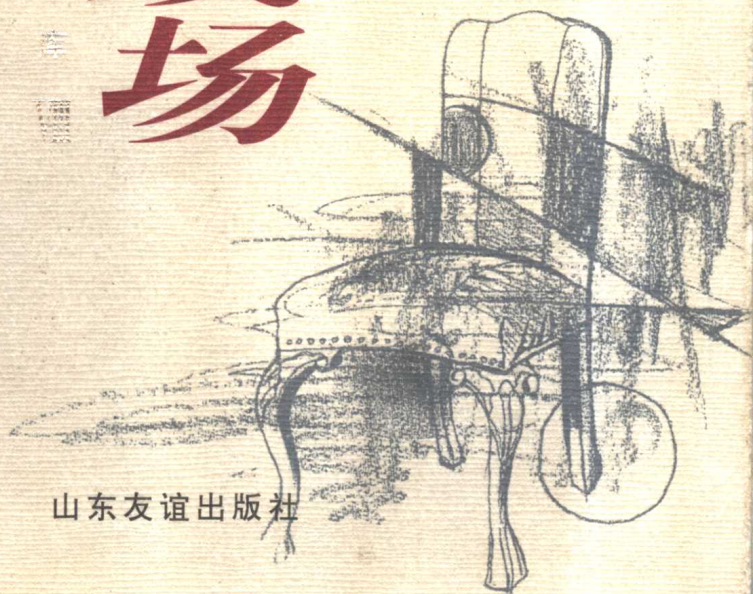
吴中杰 著



逼
近
世
纪
末
人
生

人生大戏场

山东友谊出版社



逼近世纪末人文书库(VIII)

人生大戏场

吴中杰 著

*

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地址: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:250001)

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0.125 印张 4 插页 220 千字

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4000

ISBN 7 - 80642 - 094 - 0

I·12 定价:15.00 元

目 录

世象随感

- ①商品大潮与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 3
- ②汽车与道路 12
- ③校园经济漫议 15
- ④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 17
- ⑤话说“自我感觉” 20
- ⑥《三国演义》的人才学 23
- ⑦关羽文化现象琐议 26
- ⑧广告谈 29
- ⑨无谓的浪费 31
- ⑩狮城凯旋以后 33
- ⑪义乌经济的启示 35
- ⑫有关与无关 38
- ⑬崇实与作伪 40
- ⑭症结在“创收” 42
- ⑮“帮闲”例解 44
- ⑯硬件与软件 47
- ⑰小镇与公园 52

- ⑬藏行随感 55
- ⑭接轨术衍义 61
- ⑮推销法质疑 63
- ⑯罪责 65
- ⑰教授挂像 68
- ⑱欣赏热点 71
- ⑲高官未必能教书 74
- ⑳说人情 76
- ㉑“切”的讲究 80
- ㉒谈博识及其他 83
- ㉓学术追求与经济效益
——对于大学出版社的希望 85
- ㉔“文革语言”溯源 89
- ㉕论逆向思维 92

文人书事

- ①鲁迅风骨 97
- ②为社会改革开路
——纪念鲁迅诞生 105 周年 103
- ③鲁迅情结
——序安文江《重读鲁迅 60 题》 107
- ④陈寅恪的学术精神 111
- ⑤夜读顾准 116
- ⑥从《武训传》问题说开去 119
- ⑦艺术家的修身读本
——读《傅雷家书》 123

- ⑧摆脱世俗诱惑,才是潇洒
——致安文江 126
- ⑨夏日短筒
——致陈思和 129
- ⑩文坛旁观录 131
- ⑪诗人与常人 135
- ⑫“王同亿现象”别议 138
- ⑬老调重弹 141
- ⑭隔膜:澄清王润华所说的骗局 144

悼念师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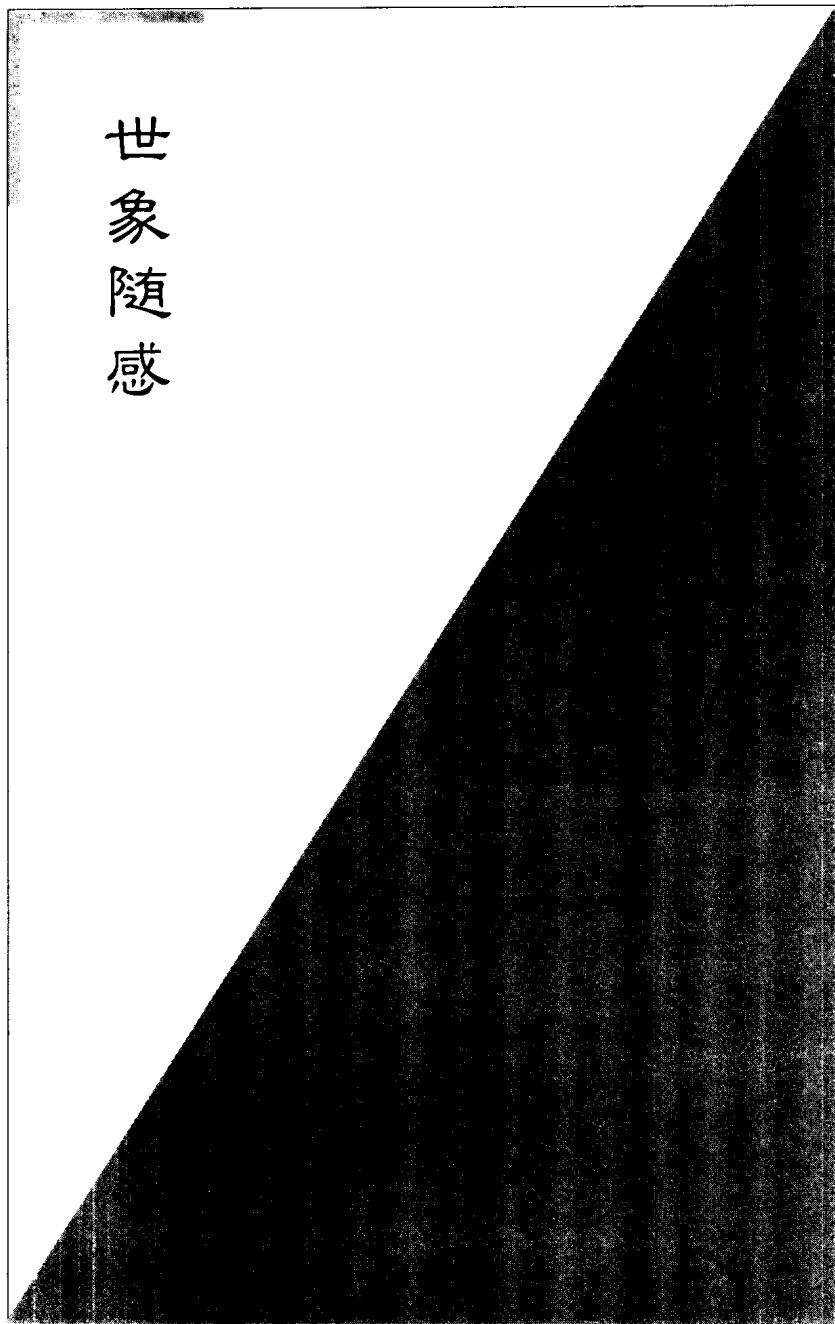
- ①高风亮节——儒医
——悼吴剑岚先生 151
- ②他悄悄地走了
——悼陈子展先生 155
- ③铮铮铁骨
——悼朱东润师 159
- ④戴厚英之死 163
- ⑤人性的悲哀
——悼戴厚英 167
- ⑥忆戴厚英 171
- ⑦从写作工具到独立文人
——戴厚英的文学道路 200
- ⑧谈《心中的坟》的出版
——兼论文艺批评的严肃性 211
- ⑨戴厚英纪念集前言 216

如烟旧梦

- ①清明纪事 221
- ②洛阳情思 225
- ③忆临海,最忆是回浦 228
- ④人生大戏场 230
- ⑤后记 317



世
象
隨
感



商品大潮与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

知识分子的悖论

我们五六十岁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，遇到两次大潮的冲击。50~60年代，在汹涌的政治大潮前面，学术活动几乎被淹没了。那时，不问政治、脱离政治是一个很大的错误，谁要是专心治学、埋首业务，就会被扣上“白专道路”、“成名成家思想”的帽子，而受到批判。到了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，干脆“停课闹革命”，强令不准读书了。然而不读书，哪里来的知识呢？没有知识，还成什么知识分子？没有各类专家，又如何建设我们的国家呢？这是很简单的道理，但是，推导这样一个简单的形式逻辑论题，却化了将近30年时间。总算挨到“文革”结束，一切都在拨乱反正，领导上宣布要尊重知识，尊重知识分子，但在社会转变机制的过程中，却又来了经济大

潮的冲击。这次大潮来势之猛,决不亚于上一次。虽然它对知识分子的冲击不再是强制性的,但在市场经济面前,一切事物都商品化了,知识和知识分子也并不例外,和其他商品一样,以市场效益来衡量其价值。而在目前的中国,一般知识的市场效益似乎并不看好,于是知识分子也就贬值了。

新的形势,出现了新的分化。这回,不再看重政治上的左中右之分,却突出地表现为经济上的差别。面对市场经济,有些知识分子迅速调整自己的业务方向,使之适合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需要,当然随之就摆脱贫困。但是,并非所有知识分子都能做到这一点,特别是那些从事基础学科、尖端科学和高雅艺术的人,还无法为国内市场所普遍接受,于是或者出国谋生,或者穷困潦倒,以至出现了“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,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刮鱼刀的”这样的奇观。耐不住贫困,耐不住寂寞的,就闯出了另一条路,叫做文人下海。下海者,弄潮经商之谓也。他们的想法是:既然那些文盲或半文盲们都能经商发财,我的知识总比他多,我的智商总比他高,难道我就不能经商发财?这种论调的确顺理成章,而且很吸引人,再加上宣传媒介的鼓吹,沸沸扬扬,文人下海就形成一股风。

文人是喜欢引经据典的。为了给自己的行为寻找依据,下海的文人就搬出了范蠡和司马相如作为前导,说是文人经商,自古而然;而不主张下海的文人则认为酷爱事业的文人们都是不怕穷困的,而且说是穷困虽不断地摧残天才,也不断地激励天才,他们还举出巴尔扎克、马克·吐温等人经商失败为例,认为文人是不能下海的。听起来各有各的道理,各有各的依据。

但我以为,这两种意见都是偏颇的。

的确,中国文人一向有“穷而后工”的说法,此话不无道



理。但这是穷通之穷,意谓不达,并非真要文人在物质生活上守穷。古代的潦倒文人如徐青藤者,也还有“三间东倒西歪屋”呢!经济是生活的基础,没有相应的物质条件,是不可能从事精神生产的。这一点,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得明白:人们首先必须吃、喝、住、穿,然后才能从事政治、科学、艺术、宗教等。当然,除了基本生活资料之外,还需要有一定的生产资料,如仪器设备、图书资料、调研费用等等,这是无需多加说明的。所以,文人不应守穷,而应摆脱贫困,以便更好地从事创造性的精神劳动。

但是,把知识分子脱贫的希望寄托在下海经商上,也未必是一条好的出路。历史上固然不乏文人经商成功的例子,正如同样也不乏文人经商失败的例子一样,任何孤立事例都不能说明问题。知识分子的路应该从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中去探求。

什么是知识分子?知识分子是从事精神生产,用自己的文化知识来为社会服务,并以此获取生活资料的一群人。

商人当然也需要文化知识,但他是在商品流通领域中活动,依靠资本的运转和利润来获取财富。

说得直白一些,知识分子是靠文化知识来工作和谋生,而商人则是靠资本增值而发财。两者的工作方式和谋生手段是不同的。知识分子一旦下海,就不靠文化工作吃饭,而靠资本的运转赚钱,这时,他就是商人,而不是知识分子了。例如,美国的哈默博士,原来是学医的,经商之后,就不再行医,虽然他仍然挂着博士头衔,但已不做知识分子的工作了。我国越大夫范蠡也是如此,他“学而优则仕”,后来功成身退去经商,但当他成为巨富陶朱公之后,就不再是越大夫,更不是当初的士了,——官与学其实也并非一回事。好比一个演员,他在不同



的戏里可以扮演各类不同的角色，观众万不可因为是同一个演员演的，而将各类角色弄串了。当然，商人也仍可以为文，如写《老残游记》，编《铁云藏龟》的刘鹗，但他毕竟是以商为主，写小说、编甲骨都只是偶一为之，至于那些以经商所得请人捉刀的“学者”，或印些不三不四的文集，周旋于雅士之间，以附庸风雅的“文人”，那只是“钱能通神”的例证，算不得知识分子行径的。汉代大文豪司马相如倒是开过小酒店，让太太卓文君当垆卖酒，自己穿着短裤洗酒坛，着实在市面上热闹了一阵子，的确可以作为文人下海的先例。但司马夫妇此举，目的在于坍丈人老头的台，迫使丈人拿出嫁妆来，一达目的，他们就打烊歇业，不再卖酒了。司马相如一篇《长门赋》，稿酬就有黄金百斤，远比开酒店收入高得多，当然不必再经商营利。其实，在内心里，他们是把商人看得很低贱的，不然，何以要化作商人，用类乎自污的手法来羞辱丈人呢？所以，这个先例其实是引不得的。

于是，知识分子陷入了这样一种矛盾的境地：下海经商可以致富，但商人并非知识分子，经商必然要脱离本行工作；若继续从事文化工作吧，则多数知识分子却又无法摆脱贫困，难以支持创造性的精神劳动。这是一种悖论，这是一个怪圈。

政策错位与自我定位

中国知识分子待遇之低，已是公认的事实。报纸上登过一条消息：某次长途班车在安徽山区遇盗，盗曰：教师靠边站，其余的人把钱拿出来！并非盗亦尊师，而是他们知道教师没有油水，犯不着啰嗦。此外，如出差时挂上标帜大学教师身份的红校徽，可以防窃，等等。此类事，耳闻目睹，简直不胜枚举。



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会与贫穷结亲呢？有一位劳动工资部门的官员在报刊上曾发表高论云：知识分子的劳动强度不及个体商贩高，劳动时间不及个体商贩长，所承担风险不如个体商贩大，所以收入理应低于个体商贩。这是既不懂马克思主义，也不了解知识分子劳动情况的说法。知识分子的工作，决不是每天8小时劳动量所能完成的。且不说实验室工作不能中断，必须夜以继日地干，就是读书、备课、写作，也并非旁人所想象的那么轻松，何况新的知识层出不穷，稍一松懈，就会脱节，赶不上时代的发展水平。而且，知识分子从事的是复杂劳动，其劳动价值决非简单劳动所可类比的，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。所以，知识分子待遇差，并非他们创造价值少，更非他们劳动强度低，而是政策错位所造成的。

工资待遇，是国民经济总收入重新分配的结果。在计划经济的国家里，这种分配带有很强的政策性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，由于习惯势力的作用，原来的分配方案还不能迅速转变，往往是直接从事物质生产和流通的人们收入增加多，而从事文化教育等工作的人则收入增加少，这样，就出现了体脑倒挂现象，复杂劳动不如简单劳动值钱。

造成政策错位的主要原因，在于对知识分子劳动价值和社会作用的认识问题。长期以来，我们的劳动岗位是分线的：直接在厂矿、田间劳动的，被称为站在劳动生产第一线；管理和流通部门就是第二线了；并非物质生产部门的知识分子，只能归于第三线，充当着被劳动人民养着的角色，当然其社会价值就不高了。当年“工宣队”进校时，曾对大学教师们训斥道：“我们劳动人民养着你们，你们却在这里干反革命勾当！”一语泄漏天机。殊不知管理和流通本身就是物质生产的重要部门，至于那个“第三线”，恩格斯早就说过：“在马克思看来，科



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、革命的力量。”抱着狭隘的观点看待社会劳动分工,当然不可能像马克思那样,对于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,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无法预见,都会感到衷心的喜悦,更不可能看到科学对于现代化社会愈来愈显得重要的趋势,因而把对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投资看作是一个沉重的财政负担。

其次,“左”的思潮也是促使知识分子的待遇愈来愈低的原因。本来,知识分子,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,历来是不薄的。外国的高工资且不去说它,即以我国而论,据苏步青先生说,他在1937年以前的月工资是320元,那时雇一个保姆只要3元,而鲁迅1926年在厦门大学的月薪是400元,他1927年到上海以后靠稿费为生,平均月收入远超过这个数。有人说,我们现在知识分子待遇低,是由于国家财政困难之故。此言似是而非。建国之初国家的经济状况比现在差多了,而那时知识分子的待遇却远比现在高。50年代定的工资标准,以8类地区而论,一级教授月薪360元,六级副教授156.5元,而大学生的伙食标准是每月12.5元,已吃得很满意了,生活补助每月3~4元,亦可应付。这就是说,当时一个最低级副教授的工资可以养10名大学生,一级教授可养20多名。应该说,在当时国家的经济状况下,知识分子的待遇还是比较丰厚的。但1957年以后就逐渐走下坡路了。因为要“反修防修”,又认为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就是修正主义的温床,所以强调以外行来领导内行,后来又有“掺沙子”之说,同时反对“三名三高”,不断降低知识分子的待遇。一种措施是降低工资标准,另一措施是长期不提级不加薪,于是知识分子就愈来愈穷。“文革”结束之后,知识分子头上的各类帽子摘掉了,而经济状况却并不见佳。现在教授的正式工资只有189.5元,加上各种



补贴，一般不过 400~500 多元，而要吃到当时 12.5 元的伙食，至少得付 200 元以上，这样，目前教授的工资只够维持两名大学生的生活，副教授以下还不到这个数。（按：本文发表于 1993 年，此处所谈是当时的工资标准。后来有所提高，但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。）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取酬，知识分子所得的报酬与他们的劳动价值太不相称了。

人类社会已进入电子时代、信息时代，科学文化在现代社会里日益显得重要了，知识分子的地位也日益重要。知识分子在一个国家受重视的程度，决定着这个国家发展的速度，同时也体现了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。我国要实现四化建设，必须重视知识分子，如果知识分子从科学文化教育岗位上大量流失，重视云云，空话一句耳！

商品意识与意识商品

知识分子不必下海经商，但并非不要商品意识。知识具有产权，也是一种商品，同样可以投放市场。出卖知识产权本是知识分子的重要财源，但由于我国知识分子长期在计划经济中生活，习惯于按指令行事，还缺乏市场观念、商品意识，而不健全的法制，对知识产权又缺乏必要的保障，甚至将靠出卖知识获利者推向审判台，就更加使人望而生畏了。知识分子的生活支出已纳入市场经济的轨道，而经济收入却仍按计划经济办事，这种双轨制的经济生活也是使他们左支右绌的原因之一。

但在知识市场上，意识商品的运转也出现了一些令人迷惑、感叹的现象：高雅的意识商品难以售出，而通俗的品种却畅销市场。比如，昆曲、京戏不能卖座，而相声、小品则大受欢迎。



迎；交响音乐会门庭冷落，而流行歌曲演唱却风靡全国；严肃文学的市场日益缩小，而低级庸俗读物则充斥街头书摊；真正的学术著作极难出版，而根据书市行情迅速拼凑、粗制滥造的“文化快餐”却很抢手。

对于此类现象，人们反应不一。有人大摇其头，骂为文化堕落；有人大声叫好，说是改革开放的成果。我以为除了伪劣意识商品必须拒斥外，对任何雅俗文化都不能一概而论。对上述现象，既要看到其必然性的一面，也要看到其不合理性的一面。既然要转轨到市场经济，当然一切都要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。适应市场需要的产品就能畅销，不适应市场需要的产品则滞销，这是必然的。其实这条适者生存的规律自古就存在。当年昆曲因其优雅而盛极一时，但当它被士大夫弄得愈来愈雅之后，就脱离了市民观众，为市民所弃。取代它而执掌剧坛帅旗的京剧，原是地方戏，进军京城也不过 200 年光景，如今，由于观众口味的变化而渐趋式微了。当然，旧品种也可以改造得适应新需求，它仍可继续生存下去，否则就难逃被淘汰的命运。而由于多数群众文化水平的限制，雅文化不及俗文化有市场，也是必然的现象。而有许多文学名著，本来也属于俗文化，雅俗之间，是会转化的。

但文化市场也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当决定商品销路的某些基本因素变化之后，需求关系必将随之而变。以书籍市场而论，目前状况是：需要学术著作和雅文学的知识分子，由于工资低没有钱买书，而有钱的生意人，却又由于文化水平低而不需要学术著作和雅文学，于是书市就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。要打破这种循环需要有两个条件：一是知识分子的工资提高了，不仅能够温饱，而且有钱买他们想买之书；二是群众——包括商贩——的文化水平提高了，那么，书市必然要起变化，



高级的文化产品就会有很大的市场。

我们需要增强商品意识,在文化工作中引入市场机制,提高竞争水平。但意识商品毕竟又不同于一般商品,它应是以质见长而不是以量取胜的创造性的产品。高质量的作品应获得更多的报酬,平均主义只能培养平庸。这需要稿费制度、专利制度等等的改革。此外,人才的合理流动是更大的竞争,也是迫使各单位提高工资待遇的重要手段。可惜人才市场迟迟未能形成。现在各单位虽有“人才交流中心”之设,但交流的往往是本单位不需要的人,至于那些业务尖子,当然是不肯拿出来交流的。而且,人才往往是被交流,而不能自己主动去流动,是整个市场经济中的一个重大问题,需要专门探讨,这里不说也罢。

知识分子的困境并不是不能摆脱的,希望在于深化改革、转变观念。当市场经济充分发展,知识市场、人才市场真正形成的时候,中国知识分子也就能走出使他们陷入困境的怪圈了。